

饶怀民、编

岳麓书社

杨毓麟集



杨毓麟集

饶怀民 / 编 岳麓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杨毓麟集/饶怀民编. —长沙:岳麓书社. 2001

ISBN 7-80665-120-9

I. 杨... II. 饶... III. ①杨毓麟—文集②诗歌—作品集—中国—现代③散文—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I21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55332 号

本书由湖南师范大学“湖湘文化研究”重点学科资助出版

责任编辑 李润英

封面设计 黄 朝

杨毓麟集

饶怀民 编

岳麓书社出版发行(长沙市新民路 10 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长沙市宏发印刷厂

2001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6.625

字数:420,000 印数:1—1,000

ISBN7-80665-120-9

G·236 定价:34.5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调换

厂址:长沙市造化塘 29 号 邮编:410007



杨毓麟像

芳園邊舟 *Timbury Park* (集灰)

幽思陵八極吹簫土一坡塘人語秋
煙碧船迎夕照黃因波鏡華
髮將夢泝流光已倦迴天地
乘桴興未忘

仙向清能未語人陳腐否

楊毓麟手迹

亂山面復水無波
寂寂經行
盡既多
初客有靈應拊
掌國人猶唱黑
那訶

再臨守仁教呈

前言

杨毓麟是辛亥革命时期杰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宣传家。他一生追随孙中山、黄兴奔走革命，以务实、勤勉、激进而著称于世。他力主“中央革命”，多次图谋打入清廷内部，实行反戈一击；积极参与响应华兴会策动的长沙起义和在上海发动的鄂、宁起义，起义失败后，他又亲制炸弹，组织暗杀团，对清廷要员实施暗杀。他还是著名的《新湖南》一书的作者，先后担任过《游学译编》、《神州日报》、《民立报》等多种报刊的总主笔或撰稿人，撰写了大量社论和时评，“皆能言人所不敢言”^①，为辛亥革命大造舆论，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黄兴赞誉他“思想缜密”，“美材也”^②；孙中山称许他“蹈海以殉”，“亡身报国”^③。其一生经历事件颇多，且留下了相当丰富的文字资料，本文拟分五个问题，概述其主要活动，同时对他的思想略加分析。

杨毓麟（1872～1911），字笃生，一号叔壬，别号蠡齋，复

- ① 于右任：《吊杨笃生文》，《于右任辛亥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96页。
- ② 黄兴：《复孙中山书》，《黄兴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0页。
- ③ 孙中山：《令陆军部准建杨、郑二烈士专祠并附祀吴、熊、杨、陈四烈士文》，《孙中山全集》第二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83页。

改号守仁，撰写文章时所署的笔名有：湖南之湖南人、三户遗民、寒灰、卖痴生、耐可、蹈海生等十多种笔名^①。1872年11月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县高桥乡一个普通农民家庭。

杨毓麟自幼聪颖，“七岁能文，惊名宿”^②，博闻强记，至十二三岁时，“已遍读十三经、《史记》、《文选》及各大名家诗、古文辞，十五岁补博士弟子员”。稍长，先后入长沙之岳麓、城南、校经三书院读书。在此期间，他“泛览国朝人经说、本国文学、历史，尤留心经世文学”^③。奠定了深厚的国学根基。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北洋海军几乎全军覆没。时杨毓麟正在校经书院读书，他极“欢迎人所著关于时事之书，独居深念，辄感愤不能自己”^④，爱国思想油然而生。他连夜奋笔疾书，作《江防海防策》，要求清政府收复失地，一洗大国惨败之辱。校经书院山长杜仲丹阅其文，赞为“景略雄谈”，“惊赏之”。但爱国与革命之间是有距离的，此时，他并未产生民主革命思想，仍未放弃科举仕途。

1897年，杨毓麟中举，入选二等优贡^⑤，以知县分发广西。正值维新运动正在酝酿之中，湘抚陈宝箴、学政徐仁铸锐意革新，并于同年10月在长沙设立时务学堂，延聘梁启超为中文总教习，李维格任西文总教习，熊希龄为学堂总理，此为湖南近代最早的新式学堂，标志着湖南维新运动的发端。杨毓麟立志改革，又颇具才名，被聘为时务学堂教习，因而未赴广西知县任。

① 关于杨毓麟的笔名除上所述外，尚有椎印寒灰、所三、三户之遗民、遗民、三户、三户之愤民、愤民、卖痴子、蹈海子等。

② 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前编上，第368页。

③ ④ 杨昌济：《蹈海烈士杨君守仁事略》，《杨昌济文集》，湖南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第29页。

⑤ 《湘学新报》载，杨为丁酉拔贡举人。

从此，他与梁启超、唐才常、谭嗣同等人一道倡言变法，成为湖南维新运动的重要骨干，他的思想开始步入改良的阶段。

杨毓麟在时务学堂任教期间，一方面利用课堂向学生反复讲解维新变法的道理；另一方面又在教学之余，为唐才常、陈为镒主编的《湘学新报》撰稿^①，并担任“掌故学”栏目的撰述^②。在该栏目发表《述长芦盐法》一文，在《湘学新报》和《湘学报》上连载，从盐政的角度倡导改革的必要性。他指出，清廷盐政“弊窦复出”，“名目多端”，“纲商习为奢汰，自放于无等之欲，一餐之费数十万钱，一衣之费数千百缗”，官吏百般勒索，巧取豪夺，往往“岁运一纲之盐，获利二三百万耳，而无名之费，乃至二二千万”，造成“商困不起”，“国课亦病”，“故道光中，长芦盐政大蹶”。嗣后，“中饱之徒，颇复营构窟穴，有名之费，若厘金、捐款之属，十增四五；无名之费，若陋规匪费及罢士游客之搜刮，亦十增四五”，“规费之属，侵渔愈甚”。他建议，改革盐政，应从下列两方面入手：1. 盐税不可过重，“宜酌定中数，而设划一之法”，“以厚商本、便民食，不当为竭泽而渔之计”。2. 朝廷宜遣通解盐法之官员，遍历各盐场，调查海盐、池盐、井盐生产之确数，引地丁口之多寡，盐商成本之轻重，运费之多少，权其大要，然后定税率，设煎盐公司，实行专卖，公司年清年课，方可凑效^③。

杨毓麟在时务学堂任教期间，还发表过有关史学的系列论

① 《湘学新报》于1897年4月创刊，在长沙出版，旬刊。该报自第二十一册起改名《湘学报》。由江标、徐仁铸先后督办，唐才常、陈为镒等主编，是维新派的喉舌，戊戌政变后停刊，共出45册。

② 《湘学报》第二十五册将“掌故学”栏目更名为“时务”栏目。

③ 杨毓麟：《述长芦盐法》，《湘学新报》第二十册、《湘学报》第二十一册至二十三册连载。

文，钩沉稽隐，从历史的角度寻找变法的理论依据。他继承了自林则徐、龚自珍、魏源以来的经世致用思想和社会改革思想，呼吁对“古史”进行改造，摒弃儒学中的糟粕，以大无畏的勇气向“正史”发起了攻击，为维新变法大造舆论。

1898年9月21日，维新运动以西太后发动政变而宣告失败；28日，谭嗣同等六人血洒北京菜市口；湘抚陈宝箴、学政徐仁铸亦被罢官，时务学堂被解散。长沙省城，风声鹤唳，“毓麟儿及于难，避乡数月乃免”^①。

1899年春，杨毓麟应乡人瞿鸿机之聘，入其幕府，瞿时任江苏学政，广揽宿学通儒入幕襄助，杨慕名而往。然而，通过一段时间的实践，他发现，原来这位老乡并不是他想象中的开明官员，而是一个趋炎附势、投机钻营的政客。官场尔虞我诈、贪污受贿，令杨忍无可忍，“终以宦途污浊辞去”^②。在此后的两年中，杨毓麟一直埋首于湘绅龙湛霖教馆，午夜青灯，他阅读私自购来的“禁书”，“以求世界之知识”，与龙氏“极相得”^③，力劝龙氏捐资兴学，龙氏允如所请。嗣后，“长沙胡子靖创办明德、经正两校，龙氏尝竭资以助，笃生实有力焉”^④。

值得一提的是，过去史学界有一种说法，认为杨毓麟参加过自立军起事，但根据现有材料分析，我们认为，杨毓麟并未参加。其理由如次：第一，遍查自立军各路统领及下属骨干名单，均无杨毓麟名号。第二，另据自立军重要首领林圭之兄林绍先所著《自立会人物考》，收录有关自立会人物共二百四十六人，亦未见列有杨毓麟名号。第三，杨毓麟本人及亲属、好友均未谈及

① ② ③ 杨殿麟：《杨毓麟事略》，载《武昌革命真史》前编上，第369页。

④ 冯自由：《新湖南作者杨笃生》，《革命逸史》第二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16页。

其参与自立军起义情事。第四，如果杨毓麟参加过自立军起事，清廷必定会将其列入追捕名单之中，但据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等人的奏陈及事败后清廷的通缉名单均未列有杨的名号。

必须指出，杨毓麟未能参与自立军起事，但并不等于说他反对此事，至少可以说他在思想上还是同情和支持的，这从他1902年冬出版的《新湖南》一书中追忆庚子自立军起事时的态度可以反映出来。自立军起事失败，唐才常等二十余人殉难，这给杨毓麟的思想以极大的刺激，催发了其民主革命思想的萌芽。

值得注意的是，杨毓麟思想的转变也与黄兴等人对他的帮助有关。黄兴曾多次劝说他放弃改良思想，走武装反清道路。后来，杨毓麟的革命活动基本上是遵循黄兴等人所拟定的既定方针进行的。

二

1901年冬，杨毓麟离开龙氏教馆，告别亲人，“挈龙氏学生颀原同渡日本”^①，在上海滞留一段时间后，于1902年4月到达日本东京。过去有一种说法，认为杨毓麟是1900年留学日本的，并与杨度同船。但据《杨毓麟家书》1909年7月9日《致夫人伢鸿》函所云“辛丑之冬”、“初春判袂”，具体时间系指1902年3月末离开上海，4月初抵达东京。这一时间与湖南留日学生“癸卯七月调查”所列《湖南同乡留学日本题名》的时间完全吻合，该题名录记载杨毓麟抵日时间为“壬寅四月”，记载杨度抵日本

^① 杨殿麟：《杨毓麟事略》，《武昌革命真史》前编上，第369页。

时间为“壬寅三月”（均指公历）^① 杨度至少比杨毓麟早到一个月时间。

杨毓麟到达日本东京后，“先入本国人设立的清华学校，学习日语、数学，甚苦”^②。旋改入日本人所办的宏文学院，复改入早稻田大学，专攻政法，“本年补官费”^③。留学期间，他接触到西方社会科学名著，使他的民主革命思想有了长足的发展，渐次趋于成熟。他运用在早稻田大学所学的知识，结合中国和湖南的具体实践，撰写了洋洋数万言的《新湖南》一书，以“湖南之湖南人”的笔名发表。该书于1902年冬在东京刊行，早于邹容的《革命军》、章炳麟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等著作^④。它的出版发行，成为杨毓麟民主革命思想成熟的重要标志。

《新湖南》虽以省区命名，“鼓吹湘省脱离满清独立之说甚力”^⑤，但其出发点并非仅仅论述湖南省范围内的区域自治，而是基于作者深厚的国学功底和对世界历史与现状的深刻了解，以其广阔的政治视野探索了二十世纪的时代特征。他指出，列强之所以推行侵略扩张政策，不是偶然的，而是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的产物，有其历史上之远因和近因：“夫所谓历史上之远因者何也？则民族建国主义是也。所谓历史上之近因者何？则由民族主义一变而为帝国主义是也。”毫无疑问，杨毓麟对于帝国主义本质的认识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先进的中国人所能达到的最深刻的理解。

① ③ 《湖南同乡留学日本题名》，《游学译编》第10册，附录。

② 杨昌济：《蹈海烈士杨君守仁事略》，《杨昌济文集》第30页。

④ 邹容的《革命军》写于1903年4月，陈天华的《猛回头》写于1903年夏，《警世钟》写于1903年秋，章炳麟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写于1903年6月。

⑤ 陶成章：《浙案纪略》，《陶成章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42页。

杨毓麟从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出发，揭示了帝国主义利用清政府统治中国人民、实施“以汉治汉”的手段，论证了反清革命的必要性。他说：“今日吾辈之所研究者，在存中国，在存湖南以存中国。苟有不必要排满而得存湖南者，吾辈不必排满可也。苟其不出于排满而必不得存湖南者，吾辈又奚为隐忍苟活坐视其亡也！”^① 杨毓麟把湖南人的历史责任放到民族运动的整体中进行考察，同时又把振兴中华的事业放在新世纪的世界全局中来认识，因而使自己的著作具有超越同时代革命党人的思想深度。《新湖南》用文言写成，专从学理上阐述政治革命和种族革命学说，鼓吹反帝反封建斗争，在“中等社会”中引起强烈反响。该书出版后，“风行于世”^②，大量“传布内地”，成为当时散布“最多”、影响最大的读物之一^③。

1902年11月14日，《游学译编》在日本东京创刊，由杨毓麟担任主编。该刊“专以输入文明、增益民智为本”。分学术、教育、军事、实业、理财、内政、外交、历史、地理、时论、新闻、小说等十二个栏目，内容非常丰富，“以译述为主”，兼刊创作。杨毓麟在该刊发表的译作《自由生产国生产日略述》、《纪十八世纪末法国之乱》等长文，介绍了西方政治学说，论述了法国革命的历史。所作《满洲问题》阐述了满洲问题的由来及其解决之方法，“声政府之罪，慷慨淋漓，声泪俱下”^④，成为传颂一时的佳作。《游学译编》与其后同在东京创刊的《湖北学生界》、《浙江潮》、《江苏》等刊物此呼彼应，从而吹响了1903年中国知

① 杨毓麟：《新湖南》，《辛亥革命时论选》第一卷，下册，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613页。

② 冯自由：《新湖南作者杨笃生》，《革命逸史》第二集，第116页。

③ 陶成章：《浙案纪略》，《陶成章集》，第342页。

④ 杨昌济：《蹈海烈士杨君守仁事略》，《杨昌济文集》，第30页。

识界新觉醒的时代号角！

三

杨毓麟求学不忘革命，在进行舆论宣传的同时，又把主要精力投入到斗争实践中去。1903年4月29日，因沙俄侵略军违约拒绝从我国东北撤军，留日学生500余人集会于东京神田锦辉馆，召开拒俄大会，声讨沙俄侵华罪行。会后，决定成立“拒俄义勇队”，杨毓麟积极参加。5月2日，拒俄义勇队改名为“学生军”，通过12条规则，杨被委任在学生军本部办事^①。由于驻日公使蔡钧横加干涉，5月11日，学生军又改名“军国民教育会”，以“养成尚武精神，实行民族主义”为宗旨^②，并提出鼓吹、起义、暗杀三种革命途径。其开展的具体革命活动是：广泛开展宣传发动，练习射击，学造炸药，派遣“运动员”回国策动武装起义、组织暗杀等。也就在5月11日军国民教育会成立之日，杨毓麟自认为“运动员”，愿意负责在江南一带策动武装起义^③。回国之前，他又与黄兴、周来苏、苏鹏等六人在军国民教育会中密组一暗杀团。又由冯自由介绍，杨与横滨的梁慕光取得联络，学制炸药，“研究爆发物十余种”^④，因制药失慎，一眼被炸伤。“党人能自造炸弹，自守仁始”^⑤。暗杀团为履行其职责，杨又与周来苏等密携炸药回国，邀约张继、何海樵等主张暗杀者同赴北京，于草头胡同租屋一间，计划在故宫内城或颐和园内一

① 冯自由：《癸卯留日学生军姓名补述》，《革命逸史》第五集，第35页。

② 冯自由：《东京军国民教育会》，《革命逸史》初集，第111页。

③ 《军国民教育会纪事》，转引自《黄兴年谱长编》第48页。

④ 冯自由：《新湖南作者杨笃生》，《革命逸史》第二集，第117页。

⑤ 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前编上，第371页。

举炸毙西太后及朝廷命官。居京数月，往返于京、津之间，终因戒备森严，无从下手，失意南返，旅居上海。

1903年12月，杨毓麟应邀回长沙，参与华兴会的筹备工作。翌年2月15日，华兴会召开正式成立大会，杨被邀出席，加入华兴会，并被派往上海，任华兴会外围组织爱国协会会长，章士钊任副会长。接着，黄兴、刘揆一与哥老会首领马福益共同议定：“计以十月十日清西太后七十生辰全省官吏在皇殿行礼时，预埋弹药其下，以炸毙之，而乘机起义。”^①爱国协会拟在上海响应长沙起义，但这次起义因奸人告密而先期流产，黄兴、刘揆一、宋教仁等华兴会主要骨干先后逃往上海。

1904年11月7日，黄兴、刘揆一、杨毓麟、章士钊等四十余人在上海英租界新闻新马路余庆里召开会议，决定“即日分途运动大江南北之学界、军队，起义鄂、宁等处”^②。不久，又因受万福华刺王之春事件的牵连，余庆里机关遭到破坏，清兵在余庆里机关搜出手枪、炸药、名册、会章等物品，清吏按册拿人，捕去黄兴等十三人，清吏还在搜寻物中发现杨毓麟名片多张，杨只好改名杨守仁，以避侦者耳目，于12月上旬与宋教仁等一道逃亡日本。

经过此次失败，他考虑到在东南沿海发动起义“不如袭取首都收效之速”，于是，“继乃变计混迹政界，以从事中央革命”^③。他再次回国入京城，在管学大臣张百熙（长沙人）的帮助下，出任译学馆教员。他以教员身份为掩护，秘密策动暗杀活动。

1905年7月16日，清廷颁发谕旨，派载泽、戴鸿慈、徐世

① ② 刘揆一：《黄兴传记》，《刘揆一集》，华中师大出版社1991年版，第163、165页。

③ 冯自由：《新湖南作者杨笃生》，《革命逸史》第二集，第117页。

昌、端方等分赴东西各国考察政治，稍后又加派绍英参与其事，凑成五人，称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杨毓麟获此消息，来到保定，对吴樾曰：“清廷伪为预备立宪，遣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以愚吾民，恐中国永无再见天日之会也。”吴樾慨然曰：“彼五大臣可击而杀之也。”^① 吴提出与其先杀铁良不如先杀五大臣的主张得到杨的首肯，但杨考虑到自制炸弹无电动开关，实施者终不免于难，因此，又不忍心让吴樾去执行这一计划。他作为“北方暗杀团”的团长，毅然力争担任炸手。吴起而制止曰：“樾生平既自为中华革命男子，决不甘为拜服异种非驴非马之立宪国民也，故宁牺牲一己肉体，以剪除此考求宪政之五大臣。”又曰：“樾请为诸君子着先鞭，更愿死后化一我而为千百我，前仆后继，不杀不休，不尽不止！”^② 并建议杨毓麟设法打入载泽幕中，以收里应外合之效。由于五大臣行期提前，吴樾急不可耐，遂于9月24日怀揣炸弹，乔装成皂隶，从容步入北京正阳门车站站台，登上五大臣专车，准备将五大臣炸毙。当机车与车厢挂钩时，因车身震动，触发炸弹，吴樾当场死难，五大臣中仅载泽、绍英受轻伤。早在五大臣出访之前，杨已预先谋得载泽随员一职，以为内应；事件发生后，清廷当时并未怀疑他，故仍以五大臣随员身份同行。五大臣因此延至12月11日启程，杨作为随员，顺利抵达东京。从吴樾谋炸五大臣的过程可知，杨毓麟自始至终参与了谋划，诚如时人所云：“吴樾之中国炸弹第一声，即守仁之秘谋也。”这一惊天之举给清政府以当头棒喝，使清朝重臣威风扫地，狼狈不堪，影响不可谓不大矣！

杨毓麟抵达东京之前，同盟会早已成立，亟待发展。杨与黄

① 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前编上，第373页。

② 《烈士吴樾意见书》，《民报》第3号。

兴、宋教仁等人会晤后毅然辞去随员职务，并于1906年6月25日正式加入同盟会，协助黄兴等人扩展同盟会组织。不久，其姊寿玉病逝，杨“归慰先慈，家居七日即返沪，自此不复履三湘故土”^①。复在沪设立正利厚成肆为江海交通机关，用以扩充组织。这年秋天，杨获悉魏蕃实与汪康年私将湘矿售予德国人开采，订约数年，屡起纠葛，约不能废。对于这种出卖利权的行为，杨深恶痛绝，于是邀约留日学生易本羲、王延祉、唐支厦等力主废约。而在沪志士童尧山、陈家鼎、廖秉衡等则主张追讨魏、汪，公推杨与魏、汪抗争。他不负众望，径赴魏处，佯称需阅条约全文、研究内容，魏不明其来意，将草约交出，杨遂将草约带走，由陈家鼎、王延祉等人将草约送交驻日公使杨枢，并报外务部，使这一草约终于得以废除。

1906年12月4日，萍浏醴起义爆发，杨毓麟准备在上海响应，但因起义很快失败而未能如愿。1907年1月，受萍浏醴起义株连，湖北日知会案发生，刘静庵等九人先后被捕，柳继贞亦被囚禁于长沙。杨四处筹措经费，托王延祉营救被捕诸人。终因王原与刘静庵密谋在湖北荆州起事响应萍浏醴起义，不便出面而作罢论。

几乎与湖北日知会案发生的同时，清吏在南京亦大兴党狱，同盟会员杨卓林、孙毓筠等人相继被捕。杨卓林坚贞不屈，视死如归。孙毓筠畏祸动摇，供出王延祉等多人，王被两江总督端方悬赏通缉，杨毓麟又设法通知王延祉，使他安全脱险。在沪期间，杨除参与收回利权斗争、响应萍浏醴起义、营救受难同志外，还用主要精力协助于右任倡办《神州日报》，继续致力于革命的宣传发动工作。

^① 曹亚伯：《杨笃生蹈海》，《武昌革命真史》前编上，第369页。

四

1907年4月2日,《神州日报》在上海创刊,它是继《警钟日报》之后,革命派在国内出版的又一份大型日报,是这一时期同盟会在东南八省进行革命宣传的重要言论机关。杨毓麟任总主笔,于右任担任社长(当时称经理)。《神州日报》虽然没有公开标榜为革命派的言论机关,“以沉郁委婉见长”,但“顾名思义,就是以祖宗缔造之艰难和历史遗产之丰富,唤起中华民族之祖国思想”,“激发潜伏的民族意识”,隐含反清革命思想。该报创刊仅三十七天,因邻居失火而连带受灾,机器设备付之一炬。火起时,杨还在伏案疾书,烈焰封门,他只好沿窗外电杆而下,仅以身免。遇火当天,《神州日报》被迫停刊。在严重的困难面前,报社同仁并未退缩,他们将这次火灾当作除旧布新的吉兆和事业成功的转折,以积极向上的态度从事恢复工作,仅中断一日,又继续出版。杨在担任《神州日报》总主笔的一年多时间里,一直“风风雨雨,夜以继日,四处奔波,可谓至苦”^①。先后发表过近十万字的政论和时评文章,他“以其坚确之辞义,抒其真挚之情感”,“欲天下哭则哭,欲天下歌则歌”,深深打动了读者,成为办《神州日报》“最努力的一个人”^②。

从杨毓麟在《神州日报》上所发表的文章看,其主要内容有如下三个方面:(一)痛陈民族危机形势,号召国人奋起反帝到底。(二)宣传“排满革命”,揭露清政府政治黑暗,官吏贪鄙残

① 于右任:《吊杨笃生文》,《于右任辛亥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96页。

② 于右任:《如何写社评》,1940年《新闻季刊》第1卷第2期。